

“科教兴国”，三问三议

Three Questions and Three Discussions on Achieving China's Rejuvenation by Science and Education

孔宪铎

(香港科技大学, 学术副校长、教授 香港 九龙, 清水湾)

编者按 本文作者孔宪铎先生是位美籍华裔资深教授、科学家, 多年前亦曾是本刊的美方编委, 1991年出任香港科技大学学术副校长。不久前孔教授将他的三篇短文投寄我刊。这三篇短文的题目实际是三问, 而内容则是针对三问的三议。作为一位科学家, 又作为一位教育家, 作者在这组文中由衷地表达了他对教育问题、科学问题、科教兴国问题的长期关注和体认, 不乏精彩、独到之处。我们经适当编删后, 将此三篇合为一篇, 且以“科教兴国”, 三问三议”为题刊出。合篇后, 文章虽长些, 但相信内地诸方读者会以极大的关切和兴味, 一口气读完, 统领要津的。也希望将读后心得观感投寄本刊, 长文短论, 均甚欢迎。

一、国兴科教: 是本? 是末?

1. 先倡导“国兴科教”, 才能达到“科教兴国”

我们都知道, 青年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所以国家要先好好地培育青年, 有了培育良好的青年, 国家才能有好的主人翁。我还记得从前有一句口号是: 时代创造青年, 青年创造时代。同一道理, 我们要先提倡“国兴科教”, 才能达到“科教兴国”的目的。国家不支持科教, 哪里会有科教? 没有科教, 又怎能谈到用科教来兴国呢?

科教的重要性,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譬如说, 在全球的富豪中, 或全球最富的华人中, 香港人不但榜上有名, 而且是连中多元。究其财富来源, 几乎全部来自房地产。现在经过了亚洲的经济危机, 大

家都觉得泡沫经济不可靠, 可靠的是发展科技。因此, 现在香港政府决心大力拨款, 以50亿港币来开创新兴科技, 向美国看齐。因为美国“全国80%的生产力增长, 都源自先进科技和知识有关的业务活动”。这真是令人兴奋的创举, 只可惜在这方面香港整整落后了一二十年。

10多年以前, 排名前10名的世界级富豪, 几乎全是石油或汽车大王。可是在今天, 排在前10名的世界富豪, 已经有一半被信息等科技产业的巨子取代了。石油大王的财富是建立在祖先留下来的天然资源上, 天然资源是取之会尽、用之会竭的。但是科技的本钱是建立在人的知识上, 人的知识是日新月异,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在某种情况下, 是越用越发达。

比尔·盖茨(Bill Gates)的微软公司是最好的

及半山区, 与218条河流交叉, 水文风险、地质风险大。总干渠平均每年都有水毁灾害发生。交叉工程按百年一遇设计耗资巨大。

新东线把输水总干渠移到了平原, 把郑州过黄移到了位山, 在调蓄工程开发后, 汉江中游梯级可在长江枯水期不引水。长江进入初汛后, 长江的水丰与黄淮海区域的需水互补, 使汛期丰水优势得到发挥。

2. 东线效益得到全面发挥

东线基本沿京杭运河输水, 输水总干渠呈中间高、两头低形式, 黄河是脊背, 东平湖是制高点。新东线北调水注入东平湖, 因此东线效益可得以全面发挥。

对于东线工程规划来说, 新东线的实质性变化是把黄河以南的提水梯级工程移向了汉江中游。这一工程的移地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工程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按东线前期工程规划设计汉江梯级建设规模, 从长江引水1000m³/s, 引水量100亿m³; 而新东线的北调水能力共451亿m³, 即为: 丹江口北调量144亿m³; 向汉江中下游供水207.4亿m³(改为北供); 从长江引水100亿m³, 超过了原东线和中线共同兴建的调水量之和。新东线北调水用电成本仅为汉江梯级提水的100亿m³用电量, 因丹江口351亿m³水量皆为自流供水。因此, 新东线南水北调供水的成本低, 农民能够接受。

(责任编辑 刘先曙)

例子,他公司的财产超过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3倍,约在2000亿美元以上,他不但是世界首富(500亿美金),而且他还造就了2000多个百万富翁。

20世纪虽仍未到来,科技竞争的世纪却早已开始了。其实,在100年以前,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就有先见地提倡“科学兴国”了,只是因为各代政府没有实行“国兴科教”政策,所以这个口号一直叫到今天。希望我们现在不要再重蹈覆辙。

2. 中国在科技上的投资太单薄

世人皆知,一个国家在科技上投资的程度,代表这一个国家对科技重视的程度。换言之,也就代表这一个国家在知识经济上收益的程度。既然如此,那么一个国家到底应该投资多少呢?请看看下面数据。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知识经济发达的国家在科技上投资的力度,就以1992年“富国俱乐部”的统计资料为例。在16个国家中,除了西班牙的投资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0.85%)之外,有7个国家在1.25%到2%,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属于这一组,分别为1.55%和1.57%。8个国家高于2%,譬如美、英、法、德、日5个国家分别为2.78%、2.22%、2.43%、2.73%和2.88%。又根据澳洲国立大学最近的调查(1996),亚洲四小龙南韩、台湾、新加坡和香港,在同年的科技投资分别为2.81%、1.90%、1.35%和0.25%。其实,根据我所得的资料,香港还不到0.1%,不是0.25%。所以曾经有人说香港的科技开发(R&D)的R是Repetition(重复)不是(Research)研究,D是Duplication(复制)不是(Development)开发。说得不错。

那么,中国在科技上的投资力度,又是如何呢?我以前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太单薄”,不信的话,请再分析一下下面的统计数据。

中国在科技上的投资力度一直很小,可是自1990年以来,更是江河日下,年年下跌,实在令人忧心忡忡。从1990到1997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以每年平均10%以上的幅度上升,而投资在科技上的数字却下跌了45%。不看下表,难以置信。

R&D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中国	0.68	0.66	0.63	0.57	0.48	0.49	0.48	0.47
南韩	1.87	1.93	2.08	2.30	2.58	2.69	2.81	2.90
台湾	1.66	1.70	1.78	1.76	1.80	1.81	1.85	1.90
新加坡	0.86	1.04	1.18	1.08	1.11	1.15	1.35	-

这些数据,除1997年之外,均取材于澳洲国立大学的统计。中国在科技上投资的力度与亚洲其他3个小龙比较,更是汗颜,他们在科技上的投资百分比不但是中国的几倍,而且是有着年年上升的趋势。在1990年,南韩、台湾和新加坡的科技投资是

中国的2.7、2.4和1.2倍,到了1996年,这个倍数已经增长到5.9、3.9和2.8倍了。

看了这个数字,你只能用“单薄”两个字来形容中国在科技上投资的力度了。

在同一资料中,可以看到投资不如中国的就只有墨西哥(0.26)、马来西亚(0.23)、菲律宾(0.14)、泰国(0.11)和印尼(0.08)了。除了印尼之外,又都比香港在科技上的投资多。

在西方国家早已走向知识经济时代并正在突飞猛进时,中国应该不再犹豫,及时迎头赶上。要达此一目的,必须唤起并改变民众意识,大力增加在科技上的投资。从前政府因为缺乏资金无能为力,现在中国在外汇储蓄上有1000多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也迈向万亿美元的时候,不能再哭穷了。钱要花在刀口上,大龙应赶上小龙。要知道在科技上的投资,所带来的何止于目前的安逸,而更是未来的繁荣和福祉。

3. 中国在教育上的投资太细弱

无可否认,教育投入的主体必然是国家,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在宪法上对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多有规定。同时,教育经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关系十分密切。在这种观念之下,各国政府的教育开支,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一个有规律的比例。一般来说,这个比例,在发达的国家为5~7%,发展中的国家为3~4%。以1988年为例,发达国家的美、英、法、加、澳、日6国,其比例分别为6.5%、5%、5.4%、7.1%、5.0%和5.5%。同一年,亚洲四小龙的比例分别是韩国3.3%、台湾4.92%、新加坡3.4%、香港2.68%。在1990年,发展中的国家则为印度3.5%、马来西亚6.9%、菲律宾2.9%、泰国3.8%、埃及6.7%、墨西哥4.1%和巴西4.6%。

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见下表),其比例则远低于上述7个发展中国家。不但如此,近年来这个比例一直有着下滑的趋势。

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

	1980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中国	2.8	2.7	2.7	2.7	2.8	2.5	2.3	2.3	2.3	2.3
香港	2.5	-	-	2.84	-	-	-	2.7	2.86	2.9

更可叹的是,中国在教育上的投资还不如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况且香港在教育上的投资也是与其经济实力不相称的,力度太小。假使我们也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中国在教育上的投资确是与其经济发展的速度不相称的。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5%时,教育投入应有大幅度的增长。可是中国在过去20年中(1978~1998),国民生产总值是以年平均9.8%的速度递增的,然而在教育投资上,不但没有大幅度

的增长,反而是下降了。这一点说明了,在中国政府的心目中,重视教育投资的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这一意识早已在中国国民(父母)的心目中建立起来了。那有父母不重视子女教育的?!

早在60年代,教育投资论已普遍地为许多政府接受,当时不论是发展中或是发达的国家,都是牺牲了许多其他花费来投资教育,但为什么中国没有,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也许是因为政府的官员们,没有想到教育投资对下一代的收益。果真如此,那么就请大家看一看,在教育上每一阶层的投资对受教育者的经济收益是多大吧。最近美国作了一项具有各种不同学历所获薪俸的差别的调查,使人耳目一新。

这项调查中显示,初中生的年薪是美元20 442,高中生27 038,大学生44 523,硕士生55 384,博士生72 099,专业人员(Professional Degree)是98 197。从这项调查中可以看到,丰富的经济收益是与教育的投入相称的。

在这里笔者想再三地举例说明,要先“国兴科教”,才能达到“科教兴国”的目的。为此,我再引用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为例。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到1987年平均递增率为8.7%。这是由于同一时期对科技投资的大幅度增加所致。韩国在1980年的科技投入为0.58%,到了1987年已经增加到1.93%了。

4. 靠的不是钱,而是头脑里的教育意识

为什么目前我们要大力加强在科技和教育上的投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在科教上的投资力度太薄弱。既然投资薄弱,就面临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无法发展科教,没有科教又哪里会有知识经济,没有知识经济又焉能“科教兴国”呢!故此,国家应该及早大量投资在科教上,至少要用国民生产总值的2%在科技上,用4%在教育上。果能如此,一代之后科教就兴旺起来了。有了兴旺的科技和教育,“科教兴国”就指日可盼了。

最后我还是要说一句老话,国家不是没钱,是没有建立起教育是最佳投资意识;相反地,家长们何以能够善待子女,让他(她)们接受完整而良好的教育?显然靠的不是家长口袋里的钱,而是家长脑袋里对教育是最佳投资意识。

所以“国兴科教”是本,“科教兴国”是末。要先有“国兴科教”的远见,才能实现“科教兴国”的国策。

二、“科教兴国”:春雷?甘雨?

1. 悬殊的比例:大学生占人口比例,50% 3%

现时,没有一个人不知道21世纪即将来临,也没有一个人不知道,21世纪将是一个科技竞争世

纪。竞争靠科技,科技靠人才,人才靠教育,教育靠政府,政府靠人才。今天,不管那个行业,其能否成功,归根结底还是靠人才,人才是万事成功之本。那么,就请看看中国在迈向21世纪的步伐中,对未来人才的培养有什么应变的措施。假使有的话,就是那句宏亮的口号“科教兴国”了。

“科教兴国”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所以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已经变成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了。可是,令人担心的是,举国上上下下高叫“科教兴国”的很多,全民层层次次推行“科教兴国”的很少。这个既定的国策,已经宣布很久了,可是一直没有看到有多少具体的行动,科研经费的比例未见增加,教育经费的比例也未见提高。雷声早已贯耳,可是甘霖仍未落地。

现在让我们先把“科”和“教”分开来看。就科学而言,在科研和开发上的投资,常常代表着一个国家对科学的重视程度。美国是科学上最发达的国家,其用于科研和开发上的经费,是国民生产总值的2.8%,其中有53%来自工业界。因为美国深信科学是无止境的,并能为人类创造未来的幸福,所以还特别指定总数的10%用作基础科学研究,追求创造与发明。再看看另一个工业先进的国家日本。日本投资在科研和开发上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比例超过美国,其中有82%来自工业界。因为日本偏重模仿,没有美国那么注重创造,所以没有设置在基础研究上的专款。这明显地显示出,美国政府是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的。美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多,这不是偶然的。

中国,虽然是大声疾呼地要“科教兴国”,其实在科研上的投资是少之又少,不但是少,而且近年来还在开倒车,节节下降,具体数字前面已经谈了。这是令人担心的。这个数值不增加的话,“科教兴国”的政策就仅仅是个春雷了。假使这个数值能够先增加到1.0%,这个春雷就会为我国的科技带来一场大大的甘雨。在科技投资上,香港更单薄,连香港国民生产总值的0.1%都不到,香港更需要甘雨。看起来,这个能降甘雨的日子还远得很,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任何雷声。只有在台湾,这个数值还比较令人满意,在1.9%左右。

“科”字讲到这里为止,现在就来谈谈“教”字吧!我们先来看看中国目前在教育方面的现状。既然是谈“科教兴国”,首当其冲的当然首先是高等教育。在美国,18至22岁的人,有50%上大学,大家还嫌不足。最近美国总统克林顿说,他要创造机会,在21世纪,让每一个适龄的美国人都可以读大学。在日本,也有一半适龄的人进入大学。亚洲的四个小龙也都迈向1/3的水平;连一向主张精英教育的英国,也把这个数字从14%提高至25%左右了。而目前中国却只有3~4%的适龄学子可以上大学。这

个数字实在太低,而且分布不均。像上海与北京,各占全国人口的1%都不到,但却有10%以上的大学。因此,上海人和北京人读大学的机会,比其他地方高出10多倍。就以笔者家乡山东临沂地区为例,人口已近千万,可是大学却无一所,那里的人,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而台湾人口2100多万,大专学校却有七八十所。真是相差太多!更不合理的是,在没有大学地区的学子们要想读大学,成绩要超过都市学子很多才行。这实在是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和发掘人才的目的。最近和宋健先生谈到此事,才知道国内像临沂这样人口众多而没有一所大学的行政地区很多。在那么多地区里,有千千万万的人才没有办法培养和发掘。根据科学统计,超常人才在每1000人中,可能会有3个。在每一个1000万人口的地区里,就有3万人。如何去培养和发掘这些人才,是中国高等教育的神圣使命。

可以设想一下,假使在一个年青的竞争队伍中,在每100人里面,只有三、四个人受过大学教育,而你的对手,却有一半的人受过大学教育,这个竞争又何以得胜呢?结果肯定是不战而败了,多么可怕!

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一直不发达呢?我的答案很简单:“政府不够重视”。现在让我们从政府、经费和父母3方面作一分析。

2. 政府的作法

百年树人,教育为先。自从立国以来,口头上没有人不强调教育的重要。问题是在“知行没有合一”。所以才有改革开放20年以来,经济与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大家都预测,中国将在21世纪成为经济大国;但笔者从来就没有听到有什么人说过,中国在21世纪的人才状况该是如何。

在笔者个人的经验里,各级政府里的大部份官员,口头上都说注重教育,其实骨子里对教育都不感兴趣,因为内心里都在紧抓经济。这种心态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政策使然。各级政府的官员,都要按照一套经济上的指标行事,指标达不到,乌纱帽不保,把经济搞上去的压力很大。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压力大到在鼓励官员们造假。更可悲的是瞒上欺下造假的人,往往反而能青云直上。相反地,政府在办高等教育上没有什么指标。政府既然没有指标,官员们也就没有压力,所以大家可以不必理会。这样的政策不改,作法不变,是没法子做到“科教兴国”的。

再直率一点来讲,受教育少的人,也难以领会到教育的价值。让一些不能领会教育的官员在地方上办教育,他们怎么会去重视教育?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国现有大学1000多所,从人口比例来讲,实在太少。美国人口是中国的1/5,大学就有3000所

以上,是中国的3倍还多。当然,以目前中国国情而言,转眼间急起追上是不合实际的。但是大学可以不必全由政府主办。私立大学在许多先进国家办得成绩斐然,中国可以试行开放,准许民间办私立大学。同时,由政府办的大学,也不必一定要供食宿,也不必一定要读4年。在实行学年学分制的情况下,聪明的学生可以不必4年就能毕业,早点让出一些空位给别人。

总之,急切需要增加大学生的比例。只要政府真心重视教育,下定决心增加读大学的人数,就绝不是做不到的。

3. 教育经费

教育经费是长期效益的投资。各国通常都是在宪法上规定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要用于教育。这个数值在欧美先进国家都在6%左右。只有加拿大突出,近年来一直超过7%。发展中国家则低一些,但是也从10多年前的3%升到目前的4%。从世界趋势来看,这个数值在逐年增加。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宪法上尚无这个规定。这已成为科教兴国的一大障碍。近年来中国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左右,实在偏低,低于亚洲10年以前的平均数值4.2%。更可怕的是其趋势是有减无增。近闻新任教育部长正努力将此数值提高到4%。香港政府库存现款至巨,可是用于教育上的经费,也是偏低,前已述及。台湾在教育上的投资比较合理,早已超过5.88%。香港实在没有理由不向其他三小龙看齐,应把这个数值增加到4%或以上。

平心而论,中国财政虽然紧缩,但钱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重视的程度。假若能省下来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请客化掉的上千亿元的钱,教育经费就可以加倍了。再加上精简各级机关节省下来的经费,那就很可观了。再说既有钱建三峡大坝,就应有钱办教育;“三峡”最终可能耗费几千亿,全国每年教育经费才不过1000多亿。所以,我说不是钱的问题,是先后次序和重视不重视的问题。人世间最重视教育的是父母,我想请求政府各级官员,以父母之心来办教育。为什么?请你看下面的分析。

4. 父母的重视

世界上的人之所以认为中国最重视教育,就是因为中国的父母特别重视教育,而不是因为中国政府重视教育。在中国,父母都认为在子女教育上的化费是最好的投资,都希望子女接受最完整的教育。在化费上,即使需要省吃俭用,束紧腰带以至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因为父母们深信,在教育上投资得到的收获是提高子女们的生活水准和改善他们的精神文明。最明显的例子是今天香港的大学学生。他们的父母有80%以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已经有一半是读过或正在读大

学的了。今天许多毕业的和在校的大学生,都不是来自富有之家。但他们的工作、生活与事业,都能跳出父母辛苦与穷困的生活圈子而步入成功康乐之途。

可惜的是,不少为父母者,一旦摇身一变成为“父母官”,其感受与观念就变了。在为父母时,把子女教育的费用看作最佳的投资,当“父母官”时,就把教育费用看成可有可无的消费;在为父母时,认定教育的收益者是下一代的子女,当“父母官”时,就要看看在教育上的短期收益者是不是自己。因为,在为父母时,都能感受到子女因受教育而带来的收益大于金钱的价值,可是当“父母官”时,一般在三五年的任期内都难以看到投资于教育上的政绩。由于以上的多种感受和心境,逐渐形成了做父母的和当“父母官”的在教育上的双重感受,从而导致对教育看法的双重标准。可惜!可惜!这难道就是人心?!就是人性?!

有鉴于此,笔者要大声疾呼:当“父母官”者,要用父母之心来办教育;举国上下,都要省吃俭用,束紧腰带,去办教育。我们只要苦一代,以后世世代代就都会好了。听到笔者话的人不会多,有些听到的也许会不悦。但笔者还是要用武训精神,不断地为教育大声疾呼,到处去大声疾呼!假使有朝一日,政府上上下下能以父母之心去办全国教育,那么,“科教兴国”的口号就既是春雷,也是甘雨了。

三、教育经费:投资?消费?

笔者曾把“科教兴国”一文分别寄给中央和香港许多主政和主持教育的高官们,但都是石沉大海。在现在的官场上,这个结果不算奇怪。奇怪的是,很多政府官员,把用在教育上的经费,视为消费。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些省市市长们说过:“教育事业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目前先集中财力投资赚钱,赚了钱才能办教育”;这种话让你听了,真是啼笑皆非。

我一直在想,也一直不了解,为什么除了父母对自己的子女之外,“父母官”们都不相信或不觉得在教育上的花费是一项最佳投资,更不去想这项投资会有深远的价值和优厚的收益呢?这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极端商业化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样样都靠数据表达,假设没有由数字对比所表现出的收益数据,就不会打动人心,更不具说服力。

因此,我近来一直在注意寻找在教育投资上收益的统计数字。非常凑巧,有一天早晨在看美国ABC晚间新闻时,看到一段关于高等教育价值的报道,大意是说从前大学生的薪俸比高中生多1/3左右,现在这个距离却是越拉越大,其差距已达到2/3

或以上。在这短短报道中还举了两个实例:一个是工作多年,已成家立业的一位中学毕业生,年薪是2.5万美元;另外一个是一位最近大学毕业受雇于一间顾问公司的职员,其年薪高达7万美元。从这一个别的案例来看,4年大学投资的收益,实在非常可观。

在美国,政府对每位在校大学生每年的投资,大约是2.5万美元,4年共10万。若以每人在大学毕业后工作40年计算,则每位大学生40年所缴的税收,要比这10万元存在银行里再加上利息的本利高10多倍。怪不得早就有人说:“教育是最好的投资”。

最近在中国也发表过,说明教育程度与人均收入关系的统计数字,即若以小学程度的收入为基数100,初中程度则是127,高中以上程度就是164。这也说明了教育有价,大学教育是很好的投资。

世界银行的报告中也同样指出:在高收入的国家,大学生占同等年龄(20~24岁)人口比重的40%,上中等收入的国家为20%,下中等收入的国家为16%,低收入国家为3%,最低收入国家为2%,这些都一再说明加强高等教育是强国富民的必要途径。要提高国民的收入,步入高收入的国家,就得大力发展高等教育。

大家知道,美国1个农民生产的粮食可以养活70个人,而中国1个农民生产的粮食还难以养活3个人。为什么?当然原因很多,但农科大学教育的普及与否是主因之一。在美国平均每万名农业人员中,有农科大学学生210人,日本50人,中国则仅有1人。怪不得目前的统计数字显示,科技在农业生产上的贡献,在发达的国家占60~80%,而在中国则仅占30%。所以中国要想在21世纪养活自己,就得努力搞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农业科技,实行真正的“科教兴农”政策。

其他企业界职工的素质对生产力的影响亦复如是。据统计中国劳动生产率还不到日本的1/10,其差距主要是源于人的素质、教育。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就非常注重教育,舍得花钱。他们为了教育而节衣缩食,把节省下来的钱,大量投资教育。战败以后的日本,从1950年到1972年的22年里,教育经费增加了25倍;而同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9倍,其中出于科技的贡献达一半以上。怪不得日本有一位首相说:“我们的经济发展不是奇迹,因为我们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教育”。

在一份最近由联合国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占有知识上的差距,最终导致国与国之间在竞争力方面的差距。”其所引用的例子是以色列。长期以来,以色列推行“科教立国”的方针,仅仅500万人口,就有大学20所,在校大学生10万以上,平均每1000个劳动力中就有77名大学生。更重要的

试论政治与教育的关系

On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s and Education

王长乐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南京 210097)

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是教育的基本社会关系之一,是教育理论研究不可忽视和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现有的教育理论研究对此却涉及不多,已有的一些研究也只是停留在较为肤浅的层次上,鲜有深刻、透彻的论述。这正如周贝隆教授在《从“危机”禁忌谈到中国的教育危机》^[1]一文中呼吁的忌谈危机并非不存在危机一样,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也并非因为人们不敢深入研究而不复存在,而是客观上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并按照各自不同的基本规律运行着,对教育及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因此,对其关系的深刻揭示和准确定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研究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原因

从人类文化史上看,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

是,在每1万人当中,就有14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要比美国的80和日本的75人还多。

回头看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24亿到1997年的74772亿,20年内增长了逾21倍;可是教育经费从1980年到1995年的16年里,只增加了11倍。在同一时期(1980~1995),在校大专学生的人数从114万增加到290万,仅仅增加了2.5倍;在1996年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仅占1.5%。不论如何,中国的教育与经济发展是相当不相称的,没有赶上时代的需求。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科技在中国经济发展上的贡献连一半还不到。理由很简单,政府不舍得在科教上花钱。在199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才是1193.8亿元,只占当年全国生产总值的1.8%,太少了!少得可怜!同一年,台湾的教育经费是当年生产总值的6%左右。更可怕的是,近年来中国的这一比例竟连续大幅度地下跌,1992年为2.94%,1993年为2.66%,1994年为2.4%,到1996年已经降至1.8%了。与此同时,如前所述,科技投资的比例也跌下来了。

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研究,一个国家,劳动力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每增加1年,就会增加国民生产总值9%。在日本和美国,教育投资在增加国民收入

教育基本理论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理论依据和前提之一。此命题在近代的教育学论著中多有涉及,而且也形成了一些成熟的理论和基本原理。本文对其再探讨,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 现行的教育与政治关系理论失于浅显

现行的教育与政治关系理论,主要分布于传统的教育学教材之中,而且几乎每一本以《教育学》命名的教材,其中都有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内容。但是,由于以往极左路线的影响,人们往往视政治为禁区,对其揭示和分析都是在肯定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往往给人以明显的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之感。现行的教育与政治关系理论,明显地存在着偏、空、旧的毛病。言其偏,是指该理论存在着明显的片面化现象。比如,在讲政治对教育的影响时,只讲政治对教育的积极影响,而不讲政治对教育的消极影响;在讲教育对政治的影响时,有许多教育的本质性影响都未涉及,如教

中做出的贡献是25%和33%。现代科技已经成为每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首要因素。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科技的贡献占60~80%,但在中国仅占30%。这不是中国不喜欢科技,而是中国的教育还没有发达达到可以推动科技达到这个水平。

笔者举了上述一连串的例子,就是想从不同角度来说明大学教育是最好的投资,而绝对不是一般的消费!这些例子都是以经济为出发点的,因为唯有如此,才能说服有权在教育事业上花钱的主管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充满商业气息的社会上,回心转意,投资教育,救救孩子。

其实,从根本上说,教育最大的目的和收益并不只是经济收益,而是提高人的素质。无可否认的是,目前国民的素质日趋下降。下降的根源是缺乏教育,缺乏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再笼统一点来讲,国民素质的种种缺陷,都与教育有关。教育程度低,文化程度就低,国民素质就自然而然低了,国家的前景也就达至值得忧虑的地步了。

上述的许多实例,难道政府的主管教育者一直还是听而不闻和视而不见吗?假如不是,就应该大大地提高在教育上的投资。千万别忘记,在教育上的投资是最好的投资!

(责任编辑 蔡德诚)